

向革命學習

號入走者獨主民個一以他
前向他勸推體實命革的大体，場
合結相碰主產共與至直，步邁
業事和賣品的務服民人得的他以
空說可列前青義主產共諸置，說
口也押生

穎 碩



習學奮轍向

鞠，務服民人爲的誠真，民人愛熱
奮轍鄒是就這，已後而死，瘁盡躬
人動感以所他是就這，神精的生先
◦方地的

東澤毛——

向華書學習

編印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東北・華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SIAN TAUFEN
SIUESI

一九四八年六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五千冊

鄒韜奮先生遺囑

我自愧能力薄弱，貢獻微少，二十餘年來追隨諸先進，努力於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進步文化事業，竭盡愚鈍，全力以赴，雖顛沛流離，艱苦危難，甘之如飴。此次在敵後根據地觀察研究，目睹人民偉大鬥爭，使我更看到新中國光明的未來，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氣和信心，奮勉自勵，爲我偉大祖國與偉大人民繼續奮鬥，但四五年來，由於環境的壓迫，我的行動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疾病經年，呻吟床蓐，竟至不起，但我心懷祖國，惓念同胞，願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後一次呼籲全國堅持團結抗戰，早日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我死後，希望能將遺體先行解剖，或可對醫學上有所貢獻，然後舉行火葬，骨灰盡可能帶往延安，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歷史，如其合規，請追認入黨，遺囑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綸女士可參加社會工作，長子

家驥專攻機械工程，次子家驥研究醫學，幼女家驥愛好文學，均望予以深造機會，俱可貢獻於偉大的革命事業。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口述簽字

目次

- 鄒韜奮先生遺稿 (一)
- 鄒韜奮先生事略 沈鈞需 (一)
- 他的出身和苦學時代 鄭恩洵 (八)
- 偉大的愛國者韜奮 胡愈之 (十一)
- 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的模範 沈志遠 (十六)
- 我們要學習韜奮精神 胡仲持 (二〇)
- 韓鶴先生的幹部政策 孫起孟 (二十四)
- 記香港戰爭時韜奮的瑣事 茅盾 (二七)
- 韓鶴先生印象 郭沫若 (三一)

從平凡處追念他的偉大……

王造時（三三）

死的征服力量……

平心（三七）

從霜奮兄想起……

恩慕（四〇）

他和人民大眾在一起……

（四二）

他是澈底的民主主義者……

（五〇）

他勇於追求進步……

（五四）

他熱情虛心大公無私……

（六〇）

他有實際認真的工作精神……

（六六）

他怎樣爲羣衆服務……

（七六）

他有堅定真誠的政治立場……

（八〇）

他怎樣辦刊物，辦書店？

（八八）

霜奮先生哀詞……

郭沫若（九五）

懷念霜奮先生……

陶行知（九八）

祭鄭霜奮先生文……

陶行知（一〇一）

鄒韜奮先生事略

先生是以筆名聞於世的，原名恩潤，有一個時候名遜庵，韜奮是在十五年主編生活週刊以後所用的筆名，學生時代最早向申報自由談話稿，筆名叫谷僧。原籍江西南昌，但先生自己在有關文件上多填江蘇上海，因自小即生活在上海。

先生是養育在大家族裏面的，父親字庸倩。同輩總排行第十四。先生出生之年，大概是辛亥前十七年九月某日。母親浙江海寧查氏，生三男三女，先生居長。不幸母親早逝，其時先生只十三歲。父親做官很清正，家裏一貧如洗，在福州候補時，要領施米貼補一家的生活，其後退休，更是一無儲蓄。所以先生少年就學時代即全靠自己設法，半工半讀，還要照顧兩個弟弟，是非常艱苦的。他在所著「經歷」裏，有很詳細的敘述。父親至今健在，年逾七十，寓居北平，家裏還有許多人；先生在上海時，迄至抗戰起來，最近在重慶這幾年，一直按月不斷匯款接濟家用。

第一個夫人葉女士，婚後不到兩年，以傷寒症去世。現在的夫人沈粹蘋女士是在接辦生活週刊這個時期結婚的，隨時隨事，協助先生，平時家庭融和快樂，故先生得一心專注

於著作。先生一生對經濟、社會、政治，堅苦奮鬥，幾乎恒久是在憂患中過生活，他所引以爲自娛的是什麼呢？他說「在那樣靜寂的夜裏，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們；……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繫着，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友叢中工作着」。這真寫出了他在埋頭寫作中，精神和意境之廣闊、偉大、飛揚、深靜，現在讀起來，似尚有萬丈光輝，射入一切寫作者的腦裏，得到心心相印的安慰，這樣，就鼓舞了他一生的努力工作。除此之外，恐怕還要算是他的家庭確給予了他以充分的安適和歡樂。此次病中及疾革時候，沈女士都在身旁。生子二，嘉驥、嘉麟，女一，嘉驅。

以上所說，是先生家庭的大概。

先生的學歷第一個階段，是經過南洋公學的附屬小學，中學，大學電機科二年級。當在中學一年級第二學期，家中經費供給已告斷絕，幸得「優行生」資格，得以免除學費，但是其他的一切費用仍是不够。父親原來希望他做工程師，經過先生自己種種考慮，改變了計劃，可說是在這時起，便下決心想做新聞記者。於是，改進聖約翰大學的文科。因爲經濟關係，在其先，並同時，兼做家庭教師。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後來出國，又會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和大學院研究。

聖約翰畢業後，依先生志願，就要進新聞界，但是事實那裏有這樣便當呢！因生活關係，便逕就地擔任了上海紗布交易所裏的英文祕書。不久，又兼就申報館助理答覆英文信件，青年會中學英文教課等事。其後，中華職業教育社請先生擔任編輯部主任，編譯職業教

育叢書和月刊，同時兼任職業學校的英文教務主任並兼教授，約七八年之久。民國十五年冬間，參加生活週刊工作，十六年辭去職教社教書職務，以整日的時間，擔任時事新報館秘書主任，晚上，還是替職教社編譯，這樣工作，約有一年光景。因生活週刊進展的速度，使先生不能不擺脫一切，開始了和他一生前途有關係的新生活。

生活週刊在先生接辦之初，每期出版只二千八百份左右，因先生負責改編，而壁壘為之一新。據先生自己說：「我接辦之後，變換內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對於編製方式的新穎和相片插圖的動目也很注意。」「每期的小言論雖僅僅數百字，却是我每過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為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其次，是信箱裏解答的文字。」「我對於搜集材料，選擇文稿，撰述評論，解答問題，都感到極深刻濃厚的興趣。我的全副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為一體了。」又說：「也許是由於我的個性的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週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於黑暗勢力不免妄迎頭痛擊」。「生活週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着密切的聯繫，社會的改進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點，如和整個社會的改造脫離關係，而斤斤較量個人的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於是，生活週刊應着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看了上面先生自己所說的幾段話，可以瞭然於當時整個生活週刊的作風和它的內容的大概。

生活週刊一天天發達，銷路擴至十五萬份以上，既為海內外數十百萬讀者所擁護，中

華職教社「深知道這個週刊在社會上確有它的效用，允許它獨立」，由是，生活週刊脫離職教社，另組合作社，產生了生活書店。後來，它的業務發展到全國分支店達四十二所，前後出版書籍一千零五十餘種，不能不說是完全由於先生心血和精誠所傾注培養而成功的。至關於它的組織，完全是合作性質，「苦幹十餘年，大家還是靠薪水養家糊口」，這種辦法，亦是由於先生意思所規劃而決定的。

生活週刊既「時時立在時代的前線」，不幸而時代的嚴重日益加甚，「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臨頭，全國震動，先生亦不得不由言論而漸入於行動。當馬占山喋血抗戰，消息轉到上海，生活週刊代收讀者捐助前方之款，數量達十二萬元，創開了在抗戰中以刊物而代收民衆捐款之門。乃患者勃起，謠諑繁興，又因參加「民權保障同盟」的緣故，遂迫使先生不得不因而在歐洲之遊，環歷地球一週，於翌年九月返國。返國後，主辦大眾生活，對於團結抗敵和民主自由，提出最明顯的主張，向政府與國人作誠懇迫切的呼籲，大聲疾呼，不遺餘力，「反映了全國救亡的高潮」。隨後，曾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二十五年，又回上海主辦生活星期刊，參加文化界救國運動，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代表大會中當選執行委員，當時四人署名提出之小冊子「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即為先生所屬草。是年，冬間，與其他諸友同時被捕，由上海押解蘇州，經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以危害民國罪起訴。嗣因「七七」事變，政府決策抗戰，獲予諒解，於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恢復，拘留二百四十三天的自由。「經歷」，「萍蹤憶語」，「展望」，「讀書

偶譯」就是在這個時候所寫成的。其後，敵人侵陷南京，先生挈家隨政府播遷武漢。政府聘任先生做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從武漢到重慶，從第一屆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到第五次大會，先生前後共提九案；而其中三案，都是爲了力爭言論自由的：第一次請具體規定檢查書報標準並統一執行；第二次請撤銷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第三次請改善審查搜查書報辦法。請撤銷原稿審查辦法案，是提出於第一屆參政會第三次大會，當時，先生在會場裏，慷慨陳辭，不亢不卑。而又曲折盡理，能使聽者心折。因是，付表決的時候，連素來反對先生的，也有人不自覺地舉起手來，遂得以大多數通過此案，誠爲從來會場所未有，這足證先生的自信力和說服他人的力量之堅強。

民國三十年春間，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將開第一次大會，先生是由政府聘請連任的，已經報到，忽於二月二十二、三等日，疊連接到昆明、成都、桂林、曲江、貴陽等處電告，所有當時僅存的幾處生活書店的分支店，也都遭受當地政府不約而同的封閉，經理、店員，非被拘即逃散！先生對此無理壓迫，感到非常痛心，尤以自己艱難締造的文化事業，橫遭摧殘到如此田地，而不能自保，更何能保障他人？遂決意辭去參政員之職，離渝赴港。在港仍爲民主抗戰，奮鬥不懈。不幸，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陷落，又避入內地，輾轉遷徙。一年前，患中耳炎症，痛苦異常，經醫生檢視，認爲是癌，至今年七月二十四日竟以此捨棄世界而去，年僅五十，誠可深悼！這在我中華民族，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是一個重大損失！

先生長於理解而又富於情感，平時言動性格，確自有其與他人迥異的特點，請即引先生自己的話來作證明罷。第一是認真，他說：「我自己做事沒有別的什麼特長，凡是擔任了一件事，我總是要認真，要負責，否則寧願不幹」；「可是我生性不做事則已，既做事就要盡力做得像樣。」辦生活週刊時，他說：「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面，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為我所不懂的，或為我所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亦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在香港辦生活日報時，他說：「坐鎮到版子鑄好上機，然後放心走出印刷所的門口，東方已放射出魚肚白了，我在筋疲力盡中，好像和什麼人吵了一夜的架。」這幾段真描寫出了他對於工作方面實踐的精神。第二是性急，他在解釋他為什麼後來不幹教員生活時說：「一因我的性太急，很容易生氣，易於疾言厲色，事後往往悵悔，對於我自己的健康也有損害，我覺得我的忍耐性太缺乏」；他敘述在時事新報做事所得的觀感中間，他稱他自己「我是個性急朋友」；他又在「稻奮自述」裏面，說他自己「特徵近視，特性性急，牛性發時容易得罪人」。誠然，依先生所說，性急也許是他的缺點，但也就正是他的優點吧。第三是求知（虛懷），他說：「十幾年來，在輿論界困知勉行的我，時刻感念的是許多指導我的師友」；又說「我個人是在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做到這裏，學到這裏；除在前進書報上求鎖鑰外，無時不惶惶然請益於師友，商討於同志」。就因為能如此求知的緣故，所以他所辦的

刊物能一期期的轉變前進，他的精神和思想，能一天天發皇和深入。第四是硬，他是在少年求學時代，因為費用不够，同時又要擔任家庭教師，常自稱「硬漢教師」，並自己加以分析，說：「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這樣的性格，遇着當前的實際環境，覺得就應該這樣做，否則便感覺得痛苦不堪忍受」；「覺得我並不是瞎硬，不是要爭什麼意氣，只是要爭我在職務上本分所應有的主權，不能容許任何方面作無理的干涉或破壞」；後來畢業做事，也說：「我對於自己的職務，不肯一絲一毫的撒爛污，但同時却不願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到了他辦生活週刊時，他說：「我只知道週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米，不知道什麼叫做情面；不知道什麼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我們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穩，毀謗誣麗是不足畏的」。第五是光明磊落，他講到他在政治上的態度時，說：「我向來並未加入任何黨派，我現在還是如此」；又說：「我服務於實論界者十幾年，當然有我的立場和主張」。我相信，先生的話當然不是信口而說的，絕對可以他的一生言論和行動來作最好的證明。

總之，賴奮先生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也不是一個有任何黨派關係的人，並且也不能把他看做只是一個新聞記者。他是一直並永遠立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而對着現實，有知識便求，有阻礙便解決，有黑暗便揭發，祇問人民大眾的需要和公意，不知自己一身的利害。就因為這樣，犧牲一切，揮洒他的熱血，傾注他的精誠，努力創辦和支持他的二十年文化事業，就因為這樣，決心參加了救國行動，努力於民主運動，就因為這樣，離開了他所幾年安居的陪都，就因為這樣，卒至不慎奔馳顛沛以迄於死。

——沈鈞儒

他的出身和苦學時代

我們老家在江西餘江縣東鄉一個叫做「沙塘村」的小村子。據說祖籍是山東，流亡到江西的年代並不久。我們的祖父，由於苦讀，中了「功名」做了官，他因為自己是窮苦出身，極力清廉自持，只以「書香傳家」四個字作為他的心願；並且受了初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感染，在滿清中葉後期（文字獄）風氣還存在的時候，他的一篇文章中却寫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的大胆的話語。我們的父親繼承了祖父的志願，在五四以後，又接受了「實業救國」的思想（這是這位後來曾經一度入南洋公學修電機工程系的原因），雖然身上窮得一文不名，但還非常熱心的集資籌辦紗廠，結果不但工廠沒開成，還欠了一身巨債，弄得一生潦倒，一事無成。

繼發就是在我們家庭這種傳統思想的影響教育下長大起來的。這種傳統思想中包括着許多好的東西，如艱苦鬥爭的精神、獨立奮鬥的作風，愛護群衆的觀點，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風氣，重視文化教育，科學教育，重視「實幹」。繼發具備着初期的民主主義思想，再加上他自己又親身經歷了近三十年來中國每一次的革命運動，就更加充實和發展了這種

傳統思想的內容。

由於家庭具有『書香傳家』這種思想，所以我們弟兄小的時候都在家裏念中文（那時候我們叫『漢文』），都不入小學，一直到十七、八歲才直接進中學；輟學更晚，大概到二十歲上下才進中學。記得一開頭他就跳了兩班，所以外國語和自然科學的學習成了他那時候嚴重的負擔。正巧那時候又碰到我們父親『丁憂』（祖父死了），不能做事，一定要在家裏閒住，家裏窮得一塌糊塗。賴只好在學校裏爭取頭三名成績，好獲得免費生資格。他進的是南洋公學（今天的交通大學）的中學部，這個學校程度相當高，『免費生』資格是很不容易取得的。他就日夜苦讀，往往搞到深夜才睡，有兩次竟然熬到咯血，由『監護』出來勸告並來信給家庭通知，要家長去信勸告（那時候我們的家在福州）。因為這樣『苦讀』，他在整個中學時期完全獲得免費生資格。中學畢業以後，起初進本校電機工程系，因為自然科學基礎究竟不強，所以只好轉學聖約翰大學念文科，他主修課是西洋文學，副修教育。這個學校是『闢公子』上的學校，不但費用很高，並且生活華貴，全校幾乎只有賴一個是『窮小子』。我們家裏當然供給不起，賴只好一方面兼賣稿，兼當家庭教師，還曾一度休學當了一年多教員來維持學用和生活。由於賣稿，他和當時東方雜誌編輯胡愈之先生相識，以後兩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和黃炎培先生以及當時文化界名流相結識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他還向當時各大雜誌、各大報紙賣稿，如學生雜誌、時事新報等都有他的文章。由於這些關係，他以後參加中華職業教育社並主編生活週刊，曾經一度

在時事新報當編輯及在瀘江大學當講師等。在這裏，也可以看出他求學時代之苦了。

——鄒恩洵